

改為「三通書局」，由日人出任經理。除中國書外，還兼售日文書。同時，「國定的教科書」也歸他獨家經售，故三通書局的業務，比較發達。該局於事變後，亦出有單行本幾種，如日華新辭典，基本日語讀本，日語會話自通，中日會話集，現代作家選集，三通小叢書等。

綜觀近三年來的出版界，已經復蘇過來，漸漸地有了生氣。我們希望由「量」的增加，能進而做到「質」的改進。能辦到這一點，出版界纔有前途之可言。否則，黑字白紙，徒徒糟躓了近千元一令的白報紙。

最近因為紙的來源不繼，逼使許多雜誌不得不停刊或合併。同時，配給也停止了，尤使雜誌難於維持。這是一件不得已的事情，也是很可痛心的事件！我往往作這樣想，苟使我們國內能製造報紙，今日之下，必不至於受到此等的威脅。可惜我們有原料而不注意造紙。

寫到這裏，我記起西哲曾說過：「一國文化的盛衰，只要從其出版物數量上就可以看得出來。出版事業如屬發達，那末，一國的文化，必不落後。反之，其文化必趨於衰落而無疑！」我往往對這幾句話出神，也就借此作為本文的結束。

三年風雨記

——風雨如晦，鷓鴣不已。——

果庵

自我到江南，轉瞬已三年了，中央大學復校三週年的日子，也差不多就是我到南京三年的紀念日。我於民國廿九年四月廿八日晨由北平動身南下，三十日正午抵下關，因為鐵路出了毛病，所以多走一天，那時距中大復校會成立只差半個月，不過我當時作事的機關，是教育部，雖與中大復校會屬於一個系統，實不相往來，且我在京，熟人可說一個沒有，每天除辦公外，形影相弔，上海一帶朋友講的話，那時還不能懂。記得在教育大樓頭看紫金山上的濛濛細雨，和聽了陰陽營宿舍的鬧鬧

青蛙，不知惹起多少家鄉的思念！這時的復校會，大體都是從前南京大學籌備會的舊人，現在統計起來，仍留在校中服務的，竟是渺如星鳳了。人事代謝，在這米珠薪桂的年頭兒，真有的想不到的速度。我來的那年，大米賣三十元一石，麵粉十元上下一包，普通一菜一湯的客飯賣四角錢，教育部職員的包飯一餐不過八塊錢，尚有魚肉可吃，但久住南京的人們，已經叫苦連天，在慨嘆物價的奇貴，彷彿較比八元一石的米價，相去太遠了，那裏知道當年冬天米價已漲至六十元一石，而三年以後

的今天，且達三百元，上海還有一千元以上的紀錄。所以不用拿別的說，單是把物價作資料，活在這三年裏的人們，已經比活三十年三百年的經驗還要多了！有人在抱怨着自己運氣不好，爲什麼趕上這麼一個時代，我則覺得這也是一種幸運，說不定我們將來會有更高的物價紀錄，那時回憶起三百元的米價，猶如今日回憶三十元時期一般的難得，杜牧阿房宮賦云：「後之視今，亦如今之視昔」，在此刻也未嘗不可應用啊！

三年之間，我在中央大學可謂無役不與，即以所擔任過的職務說，大約全校同仁二百人中，如我變化之多的，恐怕很少。我常說，我情願作人事中一味「甘草」，只要發生什麼不易解決的問題，儘管調我的職務，我絕對歡迎，同時，無論什麼事務，只要別人不願作而爲我能勉強擔任的，我也絕不推辭。中國行政機關，最苦的就是人事糾紛，而此種糾紛之癥結，差不多都由於挑肥揀瘦，人人都肯退一步想，麻煩豈不少得多了？我並不是想什麼沽名釣譽，只是不願意別人爲我爲難，進一步說，我更願意以我個人，解決人家的難題，好像這也是一種作人的義務。我是和樊校長一起進中大的，當初本打算擔任祕書的職務，這倒是比較于我合適的，後來因爲種種關係，却弄到總務處去。被任命的一天，我誠懇的堅辭許久，講老實話，我自從大學畢業以後，就過着教讀和寫作生活，行政上的經驗，可以說分毫沒有，進教育部要算我第一回脫離粉筆生涯。至於管理財產庶務，那就連小學的規模也辦不了，不要說是大學，而且是形同從新創設的大學！秦王舉鼎，自絕其膺，我委

實是不願幹這摸不清頭腦的職務的。無奈如前所云，人事問題，頂難解決，我及是不願意使人爲難的人，於是只好咬緊牙關，答應下來。我明知道是苦頭，只好去吃，我任總務，前後只有一年，但此一年光景，實在比我讀二十年書所得的經驗和教訓還要大！我體重爲這個一共瘦下去二十五磅；我是有名的頑健者，爲了許多愁煩，失去昔日的康壯與活潑；我見到人生更醜的一面，明白了若干表裏矛盾的事實。一粒沙中見世界，我這才體驗到真正「人間味」的一勺了。

由籌備會正式改爲大學，是廿九年七月廿五日的事，校長雖前幾天已經發表，可是直到這天才就職。我們由山西路教育部到國府路會址時，只有我和樊先生孫挺生先生，天氣很熱，彷彿草草招集原來工作人員說幾句話就完了。人的面孔都是生動的，我在部裏，有了兩個月的歷史，剛剛有些熟了，現在又換了一羣不相識的人，還得從頭熟起，而我這個幹事務的，更不能不多負責任，只好在庶務處擺下一桌一椅，和那些陌生的面孔對坐起來。事務上最需要交情和「關係」，但我是分毫沒有，這樣幹法，實屬創舉。此時我們最不易解決的事，就是校舍，教育部既沒有根本辦法，我們所出的主意又不能實行，至於原址，那是萬萬不能收回的，我們也早就斷了念頭了。我曾建議交涉昔日的中央研究院，即今之文物保管會，當時叫做「中支建設資料整理事務所」的，可是據說不易着手，因而根本沒有去交涉。有人說，紫竹林前市立二中的地址可利用，已經招商承修了，忽然被阻止不能進行；國府路二八二號會址，原是

東方中學，房子少得很，不要說堂堂九個學院的綜合大學，即一個學院，也是困難萬分，且還有編譯館教育建設會等機關住在那裏，若是不另外想法，簡直談不到開學。招生廣告已經登出去，報名甚至都開始了，校址還在空懸中。後來好容易奔走得略有眉目，部方原則上已答應撥給教員養成所，（即前中政校址），然而養成所已改為國立師範，如何給國師覓一適當校址以促成遷移，這又是極煩瑣技術問題。似乎部中會召集各有關機關開聯席會議，以資解決，我那天到龍蟠里去出席，竟一個人都不到，空跑一趟，後來聽說部中意旨是國師移往龍蟠里國立圖書館，圖書館則移國府路，中大再由國府路移至教員養成所。這樣走馬燈似的遷讓，牽一髮而動全身，只要一處不動，別處連帶不能動。我沒有辦法，只好找國師當局單獨商量，幾經研討，才決定中大於八月十七號先行移入，所占範圍，僅限一樓，國師則決定至八月廿五日搬。無論怎樣，這總算獲得一步進展，十七號我們就揮汗搬家，由國府路而建鄴路，我個人也從中山北路一家小公寓移住校內。在我這是很大的變化，故能清晰的記得。廿七號學校招生，新生居然有一千左右，使我們受到很大的鼓勵。考場是大禮堂，監試委員等，還有汽水西瓜前門香煙可吃，不像今日吃一頓飯都費勁，這也是值得回憶的。到考試完了，國師尚未移動，且校中還寄宿着一班中央儲備銀行的訓練班，時中儲尚未開辦，直至九月一日後，才正式移交校舍各部，九月三日全部交代完畢，爲了校舍，我確實出了不少汗，其間所經波折，還有許多不能發表的；只記得有

一天晚上，錢慰宗先生告我說趙正平先生命我次日一早去他家商量要事，偏偏這天連夜大雨傾盆，早晨六時起床，外面水深沒腰，我的房東正在走道上捉魚。我沒有辦法，叫一部包車去了，到趙公館門前，因積水甚深又門小車不能入，只得命車夫擡了進去，全部衣服，濕得淋漓滴漉。趙先生尙未起床，被我驚醒，原來叫我來正是爲商量校舍的事，雖然商量的並沒有結果，但雨中行車的一幕，實在是一生也忘記不掉的。

幹事務是永遠被誤解的，所以有的人就是有血性，也會因生氣而墮落下去，我覺得這很成問題。我個人脾氣下急，沒涵養，不會駕馭人，沒有細心，處處不合乎幹事務的條件，其失敗自是當然。但我覺得許多人對幹事務的誤解實亦太不必需，由誤解而發生意見，由意見而竟至衝突，很順利的局面，化爲極不安定，對公對私，均無好處。這也要算我的一點感觸。還有一點，就是同仁間的互相負責與督察的精神，在事務上尤不可缺，我支配庶務課，庶務課不動，庶務課支配各股，各股不動，即使動了，也是不合軌道的亂動，這種局面，任何人也幹不好。第一學期終了，同仁公宴時，我會將學校比作鐘表，同仁有如齒輪，一輪不動，全局破壞，這話大約不會有人反對吧。

農場的收拾，起初亦由我負責，那時校中所保有的農場，只太平門，光華門兩處，成賢街正進行收回，大勝關則出租給當地佃戶，鐵心橋原有土地八千餘畝，學校既無底冊，又無證件，可謂無從措手，幕府山烏龍山等處林場，已童山濯濯，好

多農民，墾為耕地。崑山稻作場，為當地佃農把持，道途遙遠，無法收回。鄭州棉作區，當然更談不到。還有太平門的蠶桑場，本是學校產業，以前有規模很好的設備，育蠶事業，與合衆蠶桑改良會合作，事變後房子早被拆得光光，本地流氓，將水泥裏的鐵筋都根根敲去，看了傷心慘目，一言難盡。我們把他略加收拾，桑樹全部整理，不意只有一年，便被友邦華中蠶絲株式會社收用，我們為這個也曾幾番奔走，孫挺生先生和本校倉光卯平先生費力尤多，然終未達到目的，想起來殊覺遺憾。我個人與農業可謂全無瓜葛，讓一個外行人來管理農場行政，且又沒空閒親自料理，請想會有什麼成績呢？當時農場同人，校中不負擔薪俸，完全由直接收入項下支付，薪水低的不過每月三十元，高的也只七十元，今日思之，直是笑話。然他們都能苦力撐持，好生活程度不十分高，還可以勉強過去。是年秋成賢街四十餘畝的田地已收回，先由佃農開闢荒地，墾成熟田，次春，才收歸校用，那時唯一可靠收入就是太平門水菓，光華門一點雜糧，和大勝關每畝四五元錢的地租。但因開支較省，到年終仍餘下來幾千塊錢，我在校務會議中提議給農場管理處同人每人加發雙薪一月，因為他們實在苦得狠，此事順利的通過了。同時，自三十年起，農場薪水全由校中發放，於是，大家的職業，才算有了正式保障。這一年春天起農場每月開例會一次，商討改進事項，好像議決的事情不少，但為了種種阻礙實現的却不甚多。直到暑假後，陳載耘先生接任農場主任，才有了驚人發展。

自三十年第一學期我又教起功課來，科目是師範專修科的文字學，每週三小時，半年授畢。一年沒吃粉筆灰，大有脾肉復生之感。本來我還負責給學校圖書館搜羅書籍的，開學後第一學期，陸續收進的書，差不多有四五千冊，這時因授文字學關係，特別多買文字金石書籍，有一大批文字書是從北平買的，自說文詁林以下凡甲骨金石之書略備，計六七十種，不過四百元錢，去年春天，正續詁林的價錢已到四五百，記在這兒，亦可備書林一滄桑。我和師專科同學發生關係自此時始；暑假後，因事務上的事太苦痛，不願意我的精神再作此種無謂消耗，在第四次懇辭之下，總算脫離了柴米油鹽，同時農場的事也決心辭去，重理舊業，仍來授讀。此明我的職務是師專科主任兼祕書，在三年中，可謂最舒適最清閒的一年。但此間所謂清閒，只是對「負責」與「費心」說，若是工作，仍還不少。頂使我頭痛的，就是每天不知多少起的來客，「今天天氣哈哈」這一套本非我所長，為了應付，不得不努力學之，也許有人說我不負責，不給人幫忙，我想大約都是此時造下的因素。中國人作事，所憑仗者，只是「活動」兩字，能力如何？品德如何？都不在話，學校本不是安插冗員的所在，學生求學，尤其應視其程度，不可一味講人情，但是寫薦信的人，總是「素仰貴校規模宏大，需人必多……」云云的一套，好像有多少人也都應當安置得下，而一到年暑假招生呢，託託的事情是更其為難，有些較熟的朋友，我便痛痛快快告訴他，這是沒用的，雖然學校回信說得很客氣，但到時是只憑分數不管人情的；假若是

生人，便要唯唯否否，答應「幫忙」二字，好把他應付出去。這種情形，我想無處不然，也無人不以此爲苦，但都不願公之筆墨罷了。我在三十一年暑假中曾爲「論通融主義」一文，刊之中報，即痛談此事，可惜注意的人不多，即使是曾經看到此文的，還照常來這一套，我倒說不出來，這種現象的責任，應當由那一方面去負。

三十年下半年起，本校開始辦附小，我被派爲負責籌備人。共招學生五班，利用女生宿舍西院課室。原來此地是農學院教室，因暑假中我經手蓋下一所新課堂，（即新生堂），農學院移至校本部，所以這裏空了出來。辦小學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事，尤其在南京，要想找一位師範畢業有教學經驗能講國語的教師，都是異常之難。市立小學教師每月薪水不過五六十元，連飯錢全不夠，我們還能苛求他的資格能力嗎？本校小學第一件要辦的，就是極力提高教師待遇，然爲經費所限，也不過只有每月百二十元。但我感到小學部的精神成績，實以開辦後第一學期爲最滿意，至少那時大家是努力前進的，時時刻刻都在想法把自己的學校弄好。我常常勸人作事只要負責任，就會有成績，並不須要聖賢才智，即使是聖賢，如取一暴十寒的態度，也要失敗。第一學期招生時僅是一百五十名，可是到寒假招編級生，就有戶限爲穿之勢！到去年（三十一年）暑假，增辦中學，小學也擴充十班，實驗學校的規模才算確立。但說起中學的開辦，實亦經過萬水千山。起初是大學部的校舍不敷應用，因想到利用金陵大學的房屋，雖然事前當局有「可能」的表示，

而具體辦法，則一點沒有。三十一年上半年，我們當局與諸同仁可謂傾全力在應付此事，孫挺生先生要算頂辛苦，我也是搖旗吶喊的一員，中間經過，一如我們接收國立師範校舍，曲折變化，說也說不盡，而且有許多話也實在無法說起。我常由學校的事推想到歷史，學校接收一幢房子還有若干内幕，想來歷史的記載，不可信的太多，而真正内幕，却永遠不在歷史中。同學們只知今日我們有高聳的北大樓，宏敞的圖書館，且有許多人嫌這個不舒服，那個不完備，以至於因房子問題發生無數的糾葛麻煩，（不祇同學）大約都不會想到交涉此房時之艱難困苦。漢高祖既得天下，諸將爭功，殆可作如是觀。大學校舍決定後，中學校舍才有着落，時已八月十五日，距開學不過半月了。七月下旬我們大膽招生，投考的有七百多名，殊出意外。不意招生廣告登出後，忽然預算又生問題，原來實校所造預算係八班，教育部只批准一班，經再三力爭，始答應辦初中三班。恰好日軍防衛司令部徵用金陵女大校舍，所有該校中學部學生，南京特務機關請教育部指定中大實校收容，於是我們驟然增加四班學生，前准預算，自不能用，照數追加，呈部批准，但不知怎麼，到行政院一審查竟不能准，起初是根本不能增，後來只准增教員薪水每月二千餘元，試思學生增加，而辦公費不增，世界上那有這樣道理？然則這些學生不點電燈，不飲自來水嗎？由這裏我體認了在中國機關辦事的又一困難，那就是上級機關對下級不了解，也不求其解，因此公事常常兜圈子，只見「等因奉此」，不見切實辦法，這是下級機關最怕的

，此殆所謂「打官話」也。後來，還是向各當局疏通得稍有眉目，再上呈文，再議，再批，差不多到八月底，方始決定，一塊石頭落了地，此與大學部為校舍問題，終日懸心，一般無二。在校舍未定以前，我們已經向浙江同鄉會交涉浙江會館的房子，預備修復借用，那個地方極其逼狹，幸而沒有走這一步，也算是邀天之幸了。

三十一年八月十五日大學部正式移至金大，我就被留在建鄴路負責辦實驗學校，大學部所兼課程，不過幾鐘點。整整兩年與同學們聚首，到此分離，我心中有說不出的惆悵！同時，中學的一切，全要從新作起，又是一番費力氣的工作；好在師專科同學畢業了，他們都願意幫我的忙，而大學部又讓給我們足敷應用的校具，儀器等，這較之一般學校，既沒有人，又沒有款，條件已是變得多了。我自己也決心要把中小學辦得像個樣子，心裏理想的標準，就是要青年們刻苦用功，整齊嚴肅，所以一切規律，全是向這方面作去。我不要在少爺式的學生，不要流氓式的學生，假定不能服從學校規約，不能沈潛用功，沒有別的辦法，只有請他走路。憑良心說，我到南京三年，可以說沒看見幾個像樣子的中學學生，他們走在路上，老是「你媽，你媽」的罵着，再不，就是到玄武湖划船專門和女同學尋開心，我們的國家民族，需要這種學生作什麼呢？分頭梳得雪亮，皮鞋光晶晶，西裝筆挺挺，就可以救國嗎？我們的學生一進校門先要剃頭髮，否則不能入校，全部學生，都要寄宿，以便養成團體生活的紀律習慣。平時不准告假，不准買零食，尤

其注意衝動式的男女關係，在身心未健全之時，我想青年還是先不要來這一套纔好。至於女生，要學燒飯，要學縫衣，要學家事要學禮儀；我并不是主張女子都去作賢妻良母，但女人總有一天是要當妻當母的，雖非「賢」「良」，至少也得有點基本知識與能力，否則，女子之所以為女子，果在何處呢？

中小學的發展，到什麼程度，我也不敢預定，我很不願意開空頭支票式的遠大計劃，只希望一步一步的作下去，一年以來似乎全體同仁尚能了解這種意義。埋頭工作，不胡鬧，不叫囂，是我們工作的唯一信條，我相信這種實事求是的態度，縱不成功，亦不至於有多大失敗。

三十一年春季，本校研究部成立，首擬發刊真知學報，每月一期，每期約十萬字。先是，頭一年的秋冬之間，已有此擬議。樊先生和我再三商量，以稿子不易收到，遂暫緩。一二·八戰後，陶亢德先生很願意辦一學術刊物，商之樊先生；陶先生對於編刊物的經驗，是大家都知道的，學校既正要作這一件事，陶君可謂來得恰好，於至南京方面由我負責收稿，上海方面由陶負責收稿，并兼辦印校。東拚西湊，一卷一期的真知學報竟於三十一年三月間問世了，這薄薄的一本，若比之事變前各學術專刊，自是大有愧色，然在戰後，差不多要算空谷登音，唯一無二。雖則銷路不好，雜誌界的作風，總算從此新闢一條路徑。我因心中高興，幾乎每期要寫一文，如繭祭魚，滿屋都成了書籍，但學術文字，那裏是彈指之間，可以幻成空中樓閣的？今日重翻舊作，覺得疏漏太多，非常自慚。然彼時與陶

君及周黎厂君等兩札往返，商討學問，快活的心情，實不像劫火後的餘生，尤似不知米已賣到三百元一石！學問的樂境，有時可以減少物質的痛苦，非有實地經驗，蓋不能談。此刊至一卷六期，因我在中學事忙，研究部改由金萬扶君負責，同時本刊——「中國學生」也出而問世。我為精力所限，學術文字，委實寫不出來，故二卷全卷的真知，我均曳白了，但本刊則每期必獻醜一番，一則覺得本刊的使命，并不小於真知，二則自己親身負着教育青年的責任，也很願意把意見拿出來給青年朋友們知道。以我個人的寫作生活說，實以最近一年以來為最雜，許多朋友所主持的刊物，都不能不敷衍，因而有時感到粗製濫造的東西，也拿出去給人看，實在很過意不去。今春金君因事脫離中大，真知的編務又落在我頭上，我因感於學術刊物每月一冊之不易討好，而紙張來源不易，力請改為季刊，現在三卷一期的季刊，已和本期的紀念號同時出版了，內容如何，大

上海最早之新聞紙

瀛瑞雜誌載：「西人於近事，日必刊刻，傳播遐邇，謂之新聞紙。……同治初年，字林印字館始設華文日報。嗣後繼起者，一曰申報，倡於同治十一年，英人美查主之；一曰彙報，倡於同治十三年，美人葛理主之；皆筆墨雅飭，識識宏通，而字林遂廢。」

家自然會看見的。我計畫這個刊物要負起文化溝通與重建的職責，目下正向北方各大學的師友徵稿，希望最短期間，有更進一步的革新。

以上所說，全是我個人的事，未免過於瑣屑，然由于個人的記載，未嘗不可對我們學校的事情窺豹一斑。此外像世界大局的動盪，中國政情之發展，都不在我描寫的對象之內。因為我沒有這種心情來說，更可以說不忍說。即以自己的家鄉論，我已七年未返，聽說是殺人如麻，十室九空，長此下去，我不敢斷定我的家還存在與否？如果是多愁的人，一定要害失眠症，我有什麼辦法呢？只有姑且聽之，自己能工作一天，便工作一天，如果對於人類社會還有利益的話，我們便不當自甘暴棄。齊風云：「風雨如晦，鷄鳴不已」，在舉世風雨之中，我只有用微小的力量，完成我可以作的工作而已，此外復何所求？